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边城》研究

□ 詹邵涵 冯希哲

【摘要】从文学地理学视角研究沈从文的《边城》，会发现边城作为独特的文学空间，蕴含丰富的伦理内涵与深刻的精神指向。碧溪咀与茶峒山城这两种景观分别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雏形，赋予置身其中的个体以不同的伦理观念，寄寓了沈从文对小人物在现代化进程中命运变动的忧思及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深切反思。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文学地理 伦理内涵 精神指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881 (2025) 13-0023-05

作家的自然地理观，是基于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的浸染而对自然界生发出的深切体悟，该观念驱使作家观物取象，直至建构出符合预期的文学空间。从文学地理学角度透视，地理因素与文学作品形成了良性互动，西方学术界的“空间转向”于20世纪中后期兴起，空间的研究热度持续攀升，出现了福柯、列斐伏尔等代表人物。有学者指出：“在更大的语境上看，20世纪后半叶对空间的思考大体呈现两种向度。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识、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状态。”^[1]空间为人物活动创设了天然背景，作品的象征含义也更加多元。

沈从文的创作与湘西紧密相关，湘西多山地、雨水与河流，湘楚文化蕴藏厚重的历史底蕴。沈从文将个人记忆与审美意识植嵌进小说环境中，赋予作品空间多重审美价值。

碧溪咀和茶峒山城的风景区人物穿针引线相关联，前者诗意十足，碧水青山、竹影幽篁，后者已浮现出现代商业文明的一角，设有厘金局、码头，暗含阶级分化与金钱交易，两者的命运走

向看似貌合神离却又殊途同归。作家巧用移步换景的技法慢慢铺开边城风景画卷（参考沈从文手绘《茶峒城势图》^[2]）。在地势图上，茶峒山城的纵横向皆有吊脚楼林立，河面布满船只，一溪之隔却是截然相反的景象，仅有一座白塔与一户人家，群山坐落于住宅附近，沈从文以此凸显生活环境的落后，从而形成“留白化”的地图空间策略。在边城中，两种景观的空间布局及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凸显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差别，导致人物固守的伦理观亦有出入。

一、碧溪咀与茶峒山城：传统与现代的雏形

空间作为可被剖析与标记的存在，是实地环境与文化意义、审美观念等形而上的复杂成分的糅合，而文学空间作为创作者虚构与想象的产物，以地理景观具象化作者的思想。景观的含义多样：作为栖居地，景观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作为符号，景观是一种记载人类历史、表达希望与理想、赖以认同和寄托的语言和精神空间^[3]。景观的组成涉及山石地貌、天象、季节及时令，甚至浓缩了风俗民情的节庆仪式被

作者简介：詹邵涵，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

冯希哲，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学与文化、当代文学、文学戏曲书法评论。

叫作“活动景观”。碧溪岨和茶峒山城便是两类同中存异的景观。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首先，两种景观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人的一切活动无法脱离自然的客观存在而进行，“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4]。在沈从文看来，“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现，即人与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现，在这里可以和感官接触”^[5]。碧溪岨四周多群山翠竹，形成天然屏障，加之气候宜人、风景秀美，是沈从文笔下的桃花源。老船夫与翠翠的淳朴品质同自然风景互为表里，老船夫忠实地摆渡，翠翠是有着天真之美的自然之子。

茶峒山城的居民因地制宜，在河边修筑码头以便上下行船时运输不同货物。面对春夏的水患，当地人已能够自如应对，临河纵向搭建吊脚楼，河街两旁的人家依据四季的变化沽酒、晒衣，城中四时之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结果，“正因为处处有奇迹可以发现，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倾心”^[2]。在边城中，人们的作息与日升月落同步，沈从文以节日注解时间的流逝，“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是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2]。因地理位置相对闭塞，人们对旧时习俗的传承相对完整，如端午节的习俗是船与船、人与鸭子的竞赛，新年是舞狮子耍龙灯，此类节庆传统彰显出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心理。

沈从文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创设特征显著的地理景观，符合其自然理念的景观往往占据风水宝地：除了《边城》中的碧溪岨坐落在事关茶峒风水的白塔下，还有《三三》中的杨家碾坊系住户凭山嘴地势构造而筑，地理位置优越；在《阿黑小史》中，类似关隘的油坊建于圆坳，占据得天独厚的有利区位，足见沈从文的自然理念是对“天

人合一”思想的复归。

2. 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

就景观设计而言，二者的布局潜藏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差异。碧溪岨被构建成有待开发的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空间，且在《茶峒城势图》中得以表征，以此证实老船夫与翠翠身为茶峒城外的“他者”形象。该地因河流阻隔且周边无邻里而显出单一封闭、不流动的特质，“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6]。祖孙二人生长于斯，仅凭方头渡船与外界人事产生交集，在固定的路线上合力摆渡以维持生计。与现代人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不同，老船夫未破坏环境而选择顺应自然，基于渡船的公益性质，两人时常拒绝渡客赠予的钱财。

茶峒的布局繁复，牵涉进更多内部要素：相对密集的人口、货币的使用与稳固的交易系统，可被视作现代商业文明表征之一。在茶峒城中，持有固定资产的小资本家与军籍人家常驻城中，当地设立厘金局、办事机关以及饭店、杂货铺、盐栈等商业性场所，用来交易的商品种类多样，“杂货铺卖美孚油，及点美孚油的洋灯与香烛纸张。油行屯桐油。盐栈堆四川火井出的青盐”^[2]。居住成员利用水陆互动的地理特征进行实地改造，推动了水陆商务的发展，商人凭“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原则实现利益最大化，在枯水季以人力挑抬进出口货物，春夏则搭乘渡船；顺顺通过购买并租借船只的方式发家致富，因仗义疏财被推为掌船执事，两个儿子天保、傩送长大后随伙计学做生意与应酬，经营规模与贸易网持续扩张。

从生产工具的产生途径来看，“耕地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产生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

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7]。老船夫与翠翠的生产劳作受季节变化和环境构造的限制,二人同自然进行交换,在宝塔下耕种以实现自给自足,即通过劳动换取自然衍生的产品。茶峒人凭货币为媒介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或以财富与权力之结合实现共赢。西美尔指出货币的使用在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货币使生产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必然将人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为他人劳动,只有所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全面的经济统一体,这样的统一体补充了个体的片面生产。最终是货币,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许多联结。”^[8]货币的流通加剧了茶峒山城与外界的密切交往,在汇集商业组织的同时拓宽了市场,加快了人口的流动,为商业文明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碧溪岨与茶峒山城在景观布局上划分出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分野,呈现出守旧和趋新的态势,与边城外的世界构成了“过去—现在—未来”这一具有流动性的隐喻,三者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始终处在“变”的坐标轴上。景观的不可迁移使渡船变成沟通碧溪岨和茶峒山城的桥梁,实质上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集起了作用。传统农业文明讲求在家庭内部形成合力,生活范围不外乎家庭、土地、河流,现代商业文明的兴起破除了这一桎梏,利益将分散四处的人聚集一堂,老船夫与翠翠已无法故步自封,社会的无形之手催逼着他们使用货币,二人从固守家宅到与城中人的交集愈发频繁,预示着现代化元素日渐渗入传统文明。相较于经济发展迅速的现代城市,茶峒山城横亘在传统与真正现代化之间的过渡区域,并逐步以缓慢的速度向“现代化”靠拢。边城是与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城市大相径庭的“旧时乡村”——拥有固定的运作系统与社会关系,而“‘边城’之所以能够成为‘过去农村’的典范,正在于小说人物所置身的世界自有其社区生活领袖与社会组织型构,‘边城’并非抽离社会伦理关系的牧歌世界或人性乌托邦。这个世界有其悲剧性,因为没有人能够逃脱时间之‘变’,

但是这种本质性悲剧显然有别于‘现代乡村’的历史性悲剧”^[9]。

二、空间构成中的伦理内涵

景观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载体,有其自身的空间排列与组合定律,人物的思想、行动根据空间的切换发生对应的变化,“作为义务的具体承担者,人的存在有其多方面的维度,人伦或伦理关系也具有多重性。从日常存在中的家庭纽带,到制度化存在中的主体间交往,伦理关系展开于生活世界、公共领域、制度结构等不同的社会空间”^[10]。景观布局的不同造就了空间内部的文明差异,从而导致人物的伦理规范产生分歧。沈从文倾向传统农业社会的伦理观,反映在作品中,边城的传统由世代积攒的经验构成,无外在权力或法令规训社会秩序,作品中的“走马路”是沈从文汲取苗民以歌为媒的婚姻传统,而“走车路”则是汉民过去一直遵循的以父母之命为核心的婚姻习俗。地势偏僻的碧溪岨承载了沈从文的乡土意识,老船夫与翠翠延续着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的伦理准则,而茶峒山城因其地理空间相对开放、商业文明日渐兴起,居民遵循的伦理观念已与利益相勾连。

1. 空间中的伦理差异

“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关系如何规范社会行为。这样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地域的层面上,也体现在家庭内外之间,禁止的与容许的行为之间。文学作品的空间含义比纯朴的地区情感更微妙。”^[11]碧溪岨和茶峒山城分属不同地理空间与文明,同时造就了其中的人物在思想观念上的微妙差异。

碧溪岨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宅空间,“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12],因人口的不流动而具备原初的信任与安全感,是老船夫与翠翠深化亲缘关系的场所。物质生活匮乏、劳动力单薄决定了家庭成员必须团结互助,两人的生活围绕渡船及河岸上的家进行。老船夫负责

摆渡过路人，翠翠在家准备三餐，父母的缺位令翠翠在劳动中建构起责任意识，辅助她成为维系家庭伦理秩序的中心成员，因而她时常为祖父分担摆渡工作。半封闭的家宅空间使个体的伦理道德身份与意识更加明晰，此处的个体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主权优先的个体，而是以责任为驱动力、以家庭和睦为目标的个体。人身关系的依附是传统伦理关系最显著的特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个体服膺于群体。祖父身为传统家庭中的尊长与劳动力，肩负起护卫家宅安定的责任及抚养翠翠长大的义务，他顺应自然的传统伦理观，认为自己应在落叶归根前为翠翠寻到归宿，即个体须融入集体以求生存。

茶峒山城作为碧溪岨以外的社会邻里空间，伦理范畴从属于传统礼教，但商业兴起势必诱发利益因子乘虚而入，感性让位于利益。在茶峒山城中，男性因创造财富而拥有领导权、话语权、选择权，从下游上来的纤夫时常拿点心洋糖换钱，一坛好酱油和美孚灯罩就能得到大多数主妇的心；女性围绕家宅打理日常琐事，城中妓女的出现源于商人和水手的需要。

2. 主要人物的伦理意识

边城中的时间概念尚未被精确，在所有伦理关系保持平衡的境况下，偶然事件与误会等于伦理变量。以翠翠和傩送互生情意为变量的起点，身为“他者”的翠翠从独户人家闯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茶峒山城，因祖父迟迟未归感到隐忧的同时被片段式的见闻冲击着感官与思想，家宅外的陌生世界促使她对祖父的惯性依赖被放大，于是她在目睹黄昏与河流、听到水手谈论妇人的父亲被杀害时预设祖父的死亡。此外，黄狗既是翠翠的伙伴，又是她行使主体权力的宣泄对象，当黄狗在进城后做出本能行径时，翠翠对它的斥责说明她意识到空间的变化，从而转变思维模式以迎合城中人的态度。傩送得知翠翠落单后派人送其回家，翠翠因此事对傩送产生了情愫，甚至对更广阔的未知世界心生想象，但面对拥有母亲陪伴和崭新衣饰的乡绅之女，翠翠因贫富差异而自惭

形秽。傩送以邀请翠翠看龙船表明心意，后者感到欣喜的同时却本能地顾虑祖父，在看龙船期间，翠翠听到旁人的对话而误会傩送倾向选择有碾坊当陪嫁的团总女儿，这与她所持有的以感情为重心的爱情观不相称。随着天保派人提亲，翠翠的理想爱情彻底幻灭，便以陪伴祖父为托辞以逃避婚姻选择，其性格折射了传统伦理造就的矜持、含蓄以及父权庇佑下形成的保守与被动。老船夫为规避女儿的爱情悲剧，对天保“走车路”不予否定，却在意识到翠翠爱傩送后感到宿命般的悲伤，因为渡船无法与碾坊相提并论。

天保所拥护的婚姻观是传统父权社会的写照，他在试探老船夫的想法时，提出自己对伴侣的要求：“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2]于他而言，婚姻是由尊长商定的人为事件，如熟人向老船夫打听翠翠的婚事时说：“便是她的事情，可是必须老的作主，人家也仍然以为在日头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得伯伯说一句话好！”^[2]傩送选择“走马路”，诗人气质使他对婚姻时重情感而轻视世俗价值的考量。直至天保的死作为极端伦理事件打破了两个家庭固有的伦理架构，与此相关的人物被迫做出选择，顺顺与傩送将天保的死归咎于老船夫和翠翠，傩送不愿接受团总的女儿而负气离开。中寨米商从中作梗，有意误导老船夫相信傩送选择团总的女儿，再提及天保的死以加剧老船夫的愧疚，此处的设定更具象征意义，以米商与老船夫的正面交流衬托出二者的价值观分别以利益和感情相维系。顺顺父子的冷漠态度及道德与良心的谴责使老船夫伴随白塔的倒下而离开人世，杨马兵的出现短暂地弥补了老船夫的空缺，却无法遮蔽翠翠再次回到孤雏状态的事实，新建的白塔与傩送是否回来共同指向翠翠命运的不可知。

“空间的实践管控生活，而不是创造生活。空间‘本身’既没有权力，也不能决定空间的矛盾。这些是社会的矛盾——也即社会中的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的矛盾，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的矛盾——它们只是出现在空间中，在空间的层面上，从而导致了空间的矛盾。”^[13]在边城中，人物之间的矛盾与误解铭刻于两层空间并不断错位，空间见证了人物陷入伦理困境的过程。老船夫与翠翠的自然淳朴与茶峒城中人的精明冷漠相悖，所产生的伦理冲突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生发龃龉的佐证。

三、结语

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观描写，不仅仅是人物性格的侧面陪衬、情节叙述的环境点缀，它往往还暗含着民族国家认同的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关涉到作品主题的表达和作家创作意图的实现”^[14]。空间作为人物伦理观的外在显现，对明确《边城》的伦理内涵与精神指向至关重要。

《边城》作为沈从文基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经验与真实世界的湘西地理空间进行想象重构的产物，创作用意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述：“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15]当现代化以不可阻挡之势蚕食各处，作家敏锐地思虑到故乡人事或将产生变动，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一切唯原始是尚的人，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好迷恋过去，盲目拒绝新潮流的作家”^[16]，他拒绝创造“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即对蒙昧的自然状态予以拒斥，但乡土意识又驱使他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发向往之情，因此塑造了边城这一充斥着伦理差异的文学空间，展现人物间的复杂情感变动及伦理选择，映射出他对小人物命运变动的关注、传统伦理境遇的思索及对现代化影响的反思。

参考文献

- [1] 陆扬. 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 (4).
- [2] 沈从文. 边城 [M]// 沈从文全集: 第8卷. 太原: 北岳

- 文艺出版社, 2002.
- [3] 张羽. 图解景观设计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5] 沈从文. 湘西 [M]// 沈从文全集: 第11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6] 费孝通. 乡土中国·乡土重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8] 西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M]. 顾仁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9] 陈彦. 《边城》及其之后: 现代性转变中的伦理图景——以《边城》、《长河》、《雪晴》系列为中心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2 (6).
- [10] 杨国荣. 伦理与存在: 道德哲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 [11] 克朗. 文化地理学 [M]. 杨淑华, 宋慧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2] 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 [M]. 张逸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13]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14] 李仲凡, 陈一军, 费团结. 文学地理学专题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 [15] 沈从文. 长河·题记 [M]// 沈从文全集: 第10卷.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16]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M]. 刘绍铭, 等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夏波)